

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和降位^{*}

——后现代主义的视角

刁伟涛

摘要:目前,西方的部分经济学家开始利用后现代主义对“经济人”假设进行批判。这些批判分为三个向度: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但是,在针对“经济人”假设提出替代性的建议时,却面临着坚持理论人本主义与放弃主体性,把经济体系看成一系列“没有主体的过程”之间的两难选择。多互决定的本体论和“切入点”的认识论可以化解这个困境,即降低“经济人”假设在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位置,不再把它作为根基或逻辑支撑点,而只是作为构建经济理论的一个“切入点”。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经济人 主体性 理论人本主义 多互决定

自从帕累托明确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全部经济分析的前提假设后,“经济人”这一概念便受到了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的批评。为了应对这些批评,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主流经济学家逐步用“理性人”这一概念代替了“经济人”(叶航、汪丁丁、罗卫东,2005)。相对于经济人假设,理性人假设主要在两个方面有所改进:一是明确了理性并不等同于自利,理性人也并不排斥利他行为;二是利用效用函数对理性进行了严格的数学形式上的表述。但是本文认为,这种改进只是表面上的和形式上的,经济人这一概念的核心并没有改变,换言之,经济人和理性人都是指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身效用函数的人,因此对理性人的批判自然地便可以看成对经济人的批判,二者面临的批判也是基本重合的。从国内的文献来看,对经济人的批判主要涉及四个方面或向度,“其一是从信息不完全及‘有限理性’的角度对理性最大化展开的批判……其二是从人的社会性对单维经济人所做的批判,它主要来自制度学派;第三是借助人类行为的实验结果来对理性最大化所进行的证伪工作”;第四是马克思主义对经济人的批判。

但是本文认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向度,即从人类主体性的角度对经济人的批判,而这主要来自于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反思主体性的思想和文化思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倾向,同时也是其核心的内容,便是对主体性的解构

(彼得·毕尔格,2004)。因此,对“经济人”的批判,便不能不提到后现代主义,同时后现代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相关论述,也会使我们对经济人问题有更为深入、更为全面的认识。为了更好并更具体地论述这个问题,本文将后现代主义进一步分为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三个维度,并首先分别介绍这三者对经济人的批判。

一、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对经济人的批判

首先从理论人本主义谈起,它指的是这样一种见解和主张,“人类主体是所有思想和实践的根基……因此历史被理解成是随主体而伴生的过程(这种主体通常是……一种人类的主体性,比如个人在自然或社会的约束下追求进步的自由,或是阶级去谋求推翻剥削与压迫)”,因此,“将人类放在进步、历史和意义的中心,是理论人本主义的标志性特征,人类主体因此成为了所有的运动——从知识的增长(它既是由人类的主体性所为,同时其目的又是为了增强人类的主体性)到对自然世界的改造(通过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的欲望和目的,比如快乐)——的出发点和归宿”(Jack Amariglio and David F. Ruccio, 2003)。可以看出,在理论人本主义中:

(1)人的主体性实际上有两个方面或维度,即实践活动的主体性和认知活动的主体性;

(2)隐含着对人类主体性的过于乐观和自信,同时有意无意地将人类的主体性看成一种先验的、独

* 本文的写作受益于贾根良教授的鼓励和指导,在此表示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立的、普遍化的客观存在。

综合考虑(1)和(2),或者说,把(2)中的主体性根据(1)分为实践活动的主体性和认知活动的主体性,那么(2)则相应地可细化成两个观点:

(2.1)将人类的实践活动的主体性看成一种先验的、独立的、普遍化的客观存在;

(2.2)将人类的认知活动的主体性看成一种先验的、独立的、普遍化的客观存在。

而(2.1)正好对应着“经济人”的假设,可以看出,理论人本主义忽视了自然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对人的主体性的巨大影响,而实际上,人都是特定时空下的人,其主体性不可避免受其所在的自然和社会的影响和塑造,当然,许多经济学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明确地提出人本主义,并对其进行了最为深刻分析,影响也最大的,当数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米歇尔·福柯。

福柯对人本主义、对人的主体性最为攻击性的批判,集中反映在他提出的“(大写的)人之死”的观点上。福柯通过对历史上的各种规训制度的考证和分析,对人的主体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社会领域,“不存在独立自主的、无处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体……主体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主体是“权力关系对身体、运动、欲望、力量施展作用的产物”(福柯,1997)。可以看出,福柯对人的主体性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转换为对经济人的批判,但是西方的理论家、社会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个问题,更没有将之引入到经济学领域,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第一个将福柯对主体性的批判引入到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是杰克·阿玛格雷奥,他在1988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福柯提出的“(大写的)人之死”正是后现代知识型的标志,而“受福柯(这种观点)深入影响的任何经济话语都必然趋向于一种后现代位置”,具体表现为“强力的反人本主义,经济分析去中心化的诉求,对把以人类为中心的分析置于首位的排斥”(Jack Amariglio,1988)等,而这也正与福柯对主体性的批判不谋而合;第二个将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批判引入到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是大卫·拉斯奥,他在1991年发表的文章中,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解构进行了介绍,他指出,“后现代主义聚焦于……主体的去中心化(多重主体位置的存在或者是多个‘主格的我’),概括地说,主体性不是优先于语言体系、权力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而是由它们所构成的”,而这种观点必然也已经对经济学产生了影响,用拉斯奥的话说就是“后现代主义已经开始重新塑形经济学”(David F. Ruccio, 1991)。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阿玛格雷奥和拉斯奥将主体性的概念引入了经济学领域,但是至少在这

两篇文章中,他们还并没有明确地将主体性(主体)与经济人联系起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2001年出版的《后现代主义、经济学和知识》一书中,阿玛格雷奥和拉斯奥在其导言中明确地指出,在经济学领域,后现代批判的对象包括理论的人本主义,而“理性的、最大化的代理人是更广阔的理论人本主义这个情景中的一个要素……后现代批判在早已存在的对经济人理念的大量批判中又增加了一种声音”。他们认为,“人类的主体性是复杂的、不确定的和不可化约的,在历史运动的剧本中,主体性既是原因,又是其结果”,主体性本身也是“不稳定的,更多的是在流动中,如一个不断分解构装和重新构装的过程”(Stephen Cullenberg, Jack Amariglio and David Ruccio, 2001)。可以看出,上述观点的一个自然而合理的推论便是:不存在先验的、统一的、独立的主体可以作为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即“经济人”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可质疑的。

二、后现代女性主义对经济人的批判

女性主义作为一股相对独立的思潮,在兴起之初与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多大联系,同时也并没有在经济学领域中产生多大影响,但是大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后现代主义逐渐对女性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现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甚至使女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整体的后现代转向;同时,女性主义也日益渗透到经济学领域,并产生了女性主义经济学这一新的学派,而作为女性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其标志性特征的便是对“经济人”男性主义倾向的批判。

1993年,《超越经济人:女性主义理论和经济学》一书出版,该书的出版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奠基性的事件(Deborah M. Figart, 2005)。该书开始对主流经济学的男性主义倾向和偏见进行清理和批判,比如在序言中,玛丽安妮·费波尔和朱莉·尼尔逊指出,“在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社会构建中,‘男性化的’主题,比如男人的和市场行为,以及‘男性化的’特征,比如自主、抽象和逻辑,逐步界定了这个领域。然而,诸如女人的和家庭行为,以及结联、形象化和情感这些特征,均被认为是‘女性化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出了主流思维”(Marianne A. Ferber and Julie A. Nelson, 2003)。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并没有对“经济人”这一概念进行论述,因此也并没有对经济人所隐含的男性主义倾向进行明确的阐述,直到1995年,朱莉·尼尔逊发表了一篇题为《女性主义与经济学》的文章,才对该问题进行了明确而详细的论述。

朱莉·尼尔逊指出,经济人这个概念倾向于描述

的是“男人的理性的、自主的、我向的行为”,而忽略了“女人的情感的、结联的、他向的行为”,同时,“经济人是完全定型的,偏好已经充分形成,并且是完全自主和自我克制的”,这种思维下的经济人仿佛“没有童年和老年,不依赖于任何人,除了自己不对任何人负责。环境对他没有影响,相反,环境只是他的理性所施于的被动对象。经济人在社会中相互作用,但是却不会被社会所影响”,因此,“目前,对人类行为的分析中忽略了社会和情感的维度,应被视为一种严重的局限性,而不是一种严谨性的标志……而这恰恰体现了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Julie A. Nelson, 1995)。

朱莉·尼尔逊对“经济人”男性主义倾向的揭示和批判,对女性主义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也基本达成了共识,她们普遍认为,“新古典的理性决策的个人有三个显著的特征:排除了个人之间的效用联系,趣味与偏好的假定外生性,个人之间效用的相互独立”(Jack Amariglio and David Ruccio, 2003),而这三个特征明显地更加符合男性的特征而不是女性的特征。同时部分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对理性或者理性选择这个概念本身也产生了质疑,认为这个术语就是一个性别化的术语,带有男性主义偏见。当然,这种观点并没有在女性主义经济学家之中达成共识,事实上也很难说理性选择这个术语或假定是否带有性别偏见,但是该术语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却往往带有男性化的倾向。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理性选择这个术语使“新古典经济学家往往倾向于应用一个狭义的、性别化的决策概念……这导致了一种占主导性的、客观的、不带感情的、男性化的方法”(Jack Amariglio and David Ruccio, 2003)。

需要指出的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人男性主义倾向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她们主张用一种“女性人”代替经济人概念,用一种女性化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取代男性化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女性主义者对经济人的质疑和力图超越,完全可以理解为对现代主义经济学家……‘经济人’概念的重新性别化或扩展性别化”(Jack Amariglio and David Ruccio, 2003)。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那么在人类行为中既要考虑理性因素,也要考虑情感因素;既要包容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立自主的行为,也能解释作为社会化的人在互为依存和内在影响下的行为;既注重行为的目的导向性,也不忽视行为的过程体验性。

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经济人的批判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由美国科学家大卫·雷·格里芬所命名和倡导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观和科学观念,它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为基础,综合了神

学、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和包括量子理论、复杂系统理论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对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世界观以及科学观念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见解和主张。在这些言论中,虽然并没有出现“经济人”这一术语,但是其中有许多涉及的正是或者直接转化为对“经济人”的见解,这首先要从牛顿主义的机械还原论的世界观谈起。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卫·伯姆(1998)认为,机械还原论的世界观有三个要旨:第一,“世界可以尽可能地被还原为一组基本要素”。第二,“这些要素彼此间基本上是外在的,它们不仅在空间上是分离的,更为重要的是,每一要素的基本性质彼此也是独立的。每一个粒子只具有它自己的性质,它也许会因为其他粒子的推挤而受到些许影响,但仅此而已”。第三,“由于要素之间仅仅是通过彼此推动而产生机械的相互作用,因而其作用力难以影响到其内在性质”。这种世界观与以牛顿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互为犄角,极大地影响和塑造了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经济观,“经济人”这一概念便集中而清晰地反映了这个问题。在主流经济学中,经济人就像经典物理学中的原子:经济人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并且具有自身稳定的性质(效用函数),经济人的相互作用型构出整个经济社会,而社会却不能改变经济人的内在性质。

可以看出,要彻底地批判经济人假定,就必须首先彻底地批判和推翻还原机械论的世界观,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正是通过详细阐述过程和联系的世界观以试图做到这一点。过程与联系的世界观认为,“事物乃是相互联系的过程……也就是说,事物并不是这种基本上分离的实体:它从外部进入关系之中并产生表面的变化而在本质上保持原有的同一性。相反,由于所有实体都同它所在世界的其他实体分享着‘内在的联系’,因而别的实体也都成了它自身的组成部分。事物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根本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界限”(凯瑟琳·凯勒, 1998),进一步说,如果机械还原论“将不连续的物体作为首要的实在,把有机体的包容与展开当成第二位的现象”,那么过程与联系的世界观则认为“包容与展开的连续运动……是第一位的,而分离的物理所当然就成为第二位的现象”(大卫·伯姆, 1998)。

因此,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十分强调内在关系的实在性,具体到人类个体而言,它认为“个体并非生来就是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或者说他(她)只是借助这些属性同其他事物发生了表面上的相互作用,而这些事物并不影响他(她)的本质。相反,个体与其躯体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较广阔的自然环境关系,与其家庭的关系,与其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个人身份的构成性东西”(大卫·雷·格里芬,

1998b)。因此,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经济人”假定用怀特海的话来说,是一种“误置的具体性”,它忽略了人类行为背后所隐藏的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深层次的机制,相反却把它们看成人人类行为的结果。

至此,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经济人”的批判已经得到基本明确的介绍,在该部分的最后,需要补充说明两点:一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世界观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二者都认为个体是整体中相互依赖的个体,都“带来一种关于世界的有机的内在联系的意识”,而这种相似性与牛顿主义的机械还原论的世界观所隐含的男性主义倾向有关,“男性的自我意识是孤立于万物的,不难发现,男性所具有的这种意识同牛顿的原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女性的自我意识是与世界血脉相连的”(凯瑟琳·凯勒,1998),因此更倾向于主张一种内在联系的世界观。二是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中,有一个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向度,也涉及了对经济人的批判。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人是处于整个生态链或生态系统中的人,人类在生态系统中有自己的位置,因而人的行为需要考虑到生态系统这一维度(王治河、薛晓源,2003),可以看出,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克服“经济人”概念中所隐藏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四、完善还是舍弃“经济人”(主体性)

(一) 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综述

上文大致介绍了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经济人”(主体性)的批判,可以看出,三者对于主体性的批判态度是一致的,但是批判之后该如何?是完善还是舍弃“经济人”(主体性)这个概念,是把经济和社会看成基于主体的过程还是一系列“没有主体的过程”,或者说,是把经过修正和完善的经济人仍作为整个经济学的前提性假设和逻辑支撑点,还是把经济人仅仅作为经济理论的一个“切入点”,抑或完全舍弃它,三者在这些问题上是有分歧的。

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主张舍弃主体性这个概念或假定,认为人类主体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或碎片化的主体。换句话说,主体性本身是不稳定的,更多的是一种处在流动中的不断分解与构装的过程,因此并不存在作为社会经济过程之本源和理论构建之根基的统一的、固稳的主体性。这首先要从主体性的社会和话语^①构建谈起,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认为主体性是一种社会和话语的构建,这意味着:(1)不存在独立于社会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都是受社会影响的,因此从假定独立的、既定的主体性出发,来构建社会和经济理论,并不是不容置疑的;(2)主体性也是部分地由各种话语所构建的,也就是说,由于“(不同的)经济话语本身有助于产生特定的主体性概念”

(Jack Amariglio and David Ruccio, 2003),因此也不存在独立于或外在于经济话语的主体性,即使承认从假定独立既定的主体去构建社会和经济理论这种做法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简化,或者说是一种理论的切入点,那么也应该认识到这种简化或切入点本身并不能被看成价值中立的,而是有着影响和塑造主体性的内在冲动与潜能。

更为重要的是,主体性的这种构建往往是散乱而不经意的,而这种散乱和不经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主体的去中心化或碎片化。社会和话语的散乱而不经意的构建,使主体“被碎片化和散分成许多心理的和认知的组成部件,在任意给定的时点上,这些组成部件并不一定会凝结成或连贯成一个统一体或本质的个体”,这种碎片化的主体“不再被看成‘完全的’或‘完整的’……主体也因此不再是‘封闭的’,而是始终保持开放状态……主体的非封闭性意味着不再有完全的‘(主格的)我’会引导其行为朝向特定的目的”(Jack Amariglio and David Ruccio, 2003)。

因此,如果“主体性碎片化和去中心化的这种观点……能够被彻底遵循,那么对于经济理论而言……本源主体这种现代主义概念将变得既不可用,又不再是必须的”,因此,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主张舍弃主体性概念,“不再用一种本源的或本质的原因这种思维方式看待经济体系……而是把它看成一系列‘没有主体的过程’”(Jack Amariglio and David Ruccio, 2003)。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张保留主体性这一概念,但是需要经过修正与完善,它认为现代主义中的主体性概念过于专断和“以我为中心”,往往倾向于把“非我”或“它者”泛客体化,忽略了不同主体间的相互构造性和联系,因此它主张一种联系中的主体性,即“主体间性”,也被称之为“关系中的自我”。^②

而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于主体性这一概念的态度,正好介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之间,或者说,它的态度是复杂而矛盾的。

一方面,部分女性主义经济学家主张,“必须超越如下的这么一种观点:新古典理论所表述的认知和行动主体——尽管是高度性别化的——的观点仅仅是不全面的问题,就好像人类的主体性是‘外在那儿的’,只等待在经济话语中得到充分或不充分的表述,同时也好像,只要得到合适的重新性别化,那么‘社会化了的和实体形态化了的人’将会消除在经济学中所有的男性主义偏见”。这些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这样的一种观点,即修正在新古典的主体概念中隐含的性别偏见,不仅激发了经验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现代主义者主张,并且它使主体性是经济学的一个必须的起点(这种观点)丝毫未受触动”,因此,她们把焦点“集中到了主体性社会的和散乱而不经意的构建上”,认为对于经济理论中的主体性“一

个替代的方法是使主体本身变得‘不可能’，同时也使它对于经济理论和经济事件的分析变得不可用和非必须”(Jack Amariglio and David Ruccio, 2003)，用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把经济体系看成一系列“没有主体的过程”。

另一方面，这种放弃主体性的主张遭到了“将使经济理论本身变得不可能”的攻击，面对这种攻击，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并没有进行有力的回击，相反，她们的态度似乎是左右摇摆、犹豫不定的，因此，虽然这些女性主义经济学家主张放弃主体性概念，但是她们却对“证明”关于主体性的替代性概念，或者重新统一或重新构造一种主体，以作为经济理论中心的现代主义的做法实际上保持了沉默。^⑬

(二) 本文的观点

首先对上述三种观点做一简要评论：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主张全面解构主体性，这一主张本身便是蕴含着内在矛盾或悖论的，解构主体性这一主张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主体性；其次，具体到经济学领域，它主张把经济看成“没有主体的过程”，将意味着任何经济理论的构建都是可疑的因而变得不可能，并极易滑向极端的构建主义、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张用“主体间性”或“关系中的自我”代替主体性，是一种很好的思路，但是由于目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还没有被明确地引入到经济学领域中，或者说，还没有对经济学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主体间性”的主张还没有具体转化为对经济学、对“经济人”的主张；而后现代女性主义虽然明确地反对“经济人”概念，反对把主体性（即使是重新性别化和社会构建化）仍作为经济理论的根基和出发点，但是它并没有提出一个建设性的、替代“经济人”的主张，并且女性主义对上述主张的坚持并不坚定，其态度是矛盾的。

本文的主张：由于人类主体性的社会和话语构建，并且这种构建往往是散乱而不经意的，因此放弃理论人本主义，不再把主体性，或者更具体地说，“经济人”作为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的假设前提、理论根基和逻辑出发点；但同时也并不彻底否定或舍弃“经济人”，而是继续保留它，只是把它“降级”为构建经济理论的一个“切入点”。

“切入点”这一概念是由马克思主义学者斯蒂芬·瑞斯内克和理查德·沃尔夫较早明确提出来的，它是指“一个理论所使用的，借以进入它的系统阐述，进入它对实体和关系的特有构建”（Stephen Resnick and Richard Wolff, 1985）的一个概念，而要很好地理解“切入点”，则首先要从另外一个概念“多互决定”说起。

“多互决定”最早是由阿尔都塞明确提出的，起初主要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用来指称如下观点：“构成总体性的所有矛盾都是相互作用地决定了彼

此。矛盾是每一个其他矛盾的内在条件，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完全归结到其他矛盾所致”（Stephen Cullenberg, 1999）。后来“多互决定”这一概念被斯蒂芬·瑞斯内克和理查德·沃尔夫进一步发挥、发展，并具体而明确地运用到了社会理论（包括经济学领域）。他们把“多互决定”发展成为了一种在社会和经济理论中关于因果关系及其解释的观点，即“多互决定”拒绝任何这样的假设：复杂的事物能够被还原为从单一原因到结果的简单性，而是接受这样的假设：在不同的情境中，任何事件都可以成为决定另一个事件的显著因素，任何原因本身也是一种结果，反之亦然”（Stephen Resnick and Richard Wolff, 1985）。^⑭具体到个人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来说，社会既是由个人组成和构建的，但同时社会又塑造和构建着其中的个人，因此，既不存在先验的、既定的个人，认为社会是其相互作用的均衡状态，也不存在先验的社会可以从中推论出个人的行为，甚至其自身的发展进程，进一步说，个人并不是一种固稳的和“未受污染的”构建社会理论的出发点。从这个角度看，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全部经济理论的根基和逻辑支撑点，是完全可以对其质疑的。

但是，质疑之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有什么建设性或替代性的方法吗？由于社会内部各种要素或事物的相互决定，因此，不存在任何一种固稳的、“未受污染的”要素或事物可以作为经济理论的根基和逻辑支撑点，寻找“经济人”的替代概念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需要另寻他途，而本文所主张的“他途”正是上文提到的“切入点”这一思路，即把经济人作为构建经济理论的一个切入点。

在内部要素或事物多互决定的经济社会中，为了构建出逻辑内恰的社会理论体系，“分析者必须首先选择一个切入点开始探索……然后分析者能够从复杂的因果结联中‘鼓捣’出影响被研究实体的特定的因果链”（William Waller, 1999），从而构筑出一个理论体系。可以看出，“经济人”完全可以找出很好地构建经济理论和进行经济分析的一个切入点。

对于“切入点”，需要另外特别指出的是：（1）切入点的选择是先于理论构建的，或者说是处于理论体系之外的，因此一个理论体系自身并不能证明其切入点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甚至把切入点逐渐变成整个理论体系的根基和前提，这是具有很大风险的；（2）既然切入点的选择不能从理论中推论出来，同时也是先于理论而存在的，那么为什么选择一个特定的事物或因素作为切入点，其答案必定要在理论之外、在理论构建之前找寻。本文认为，切入点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构建者主体性的结果或产物，因此任何切入点的选择以及由此构建的社会理论，“必定是片面的、暂时的、试验性的，也必定是情境相关的”（William Waller, 1999）。

把“经济人”作为经济理论的一个切入点,意味着不再过于执着于“经济人”假定,甚至把它作为经济理论的根基或逻辑支撑点;意味着“降级”经济人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并时常对“经济人”进行反思和完善,因而对针对于经济人的批评更加宽容和包容;意味着“经济人”成为经济理论众多可能的切入点中的一个,因而使构建于“经济人”切入点的主流经济学对于构建其他切入点的“异端”经济理论更加宽容,并倾向于一种增进了解、建设性对话的态度,因为“不同的叙事都提供了它们自己的切入点……这既是对彼此的挑战,更能为彼此提供理论养料”(Robert F. Garnett, 1999)。

五、余论:后现代主义与经济学

至此,后现代主义对“经济人”的批判,本文已经做出了大致轮廓的论述,同时也提出了超越“经济人”假定的建设性建议。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对于经济学的涉及和影响,绝不仅仅限于对“经济人”或主体性的批判,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对立面和超越者,对整个经济学理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总体上来说倾向于一种现代主义的经济学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后现代要素,因此有时也被称为一种后现代转向。^⑩

但是本文不得不指出的是,也有不少的西方经济学家对于后现代主义是不以为然的,比如马克·布劳格认为,“在经济学中后现代主义表现为多种形式,但是它总是以下列做法为出发点:嘲笑经济学的科学自负;给一个客观的经济系统‘外在那儿’的这种观点泼冷水,反对我们能够估量经济理论的解释性力量;嘲弄经济学家能够对经济事件做出精确的预测这种观点;并且否认在竞争性的经济理论中间做出选择时有任何的(现实)基础,而是取决于经济学家的个人偏好。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经济学家进行说服的工具只是一系列或明确、或隐含的修辞方法,因此,经济学最终是一个与文学批评、美学或者哲学没有多大区别的科目”(Mark Blaug, 1998),而希拉·道(2005)也有类似的观点,^⑪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为数不少的经济学家对后现代主义的漠视和排斥,也使目前对后现代主义的接纳和研究仍局限于人数相对较少的经济学家群体中。但是,后现代主义绝对不是部分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相对主义、构建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是一种“什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的学术态度,是一种只有解构性、否定性而无建设性、肯定性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主张。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是包含着更加丰富的内容的,它对理论视角性的强调,对理论价值取向性的认同,对知识和社会互动的关注,对各种理论构建可能性的洞见,对理论的本质主义、简化主义和决定论的抨击等,已经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虽然这些影响中的大部分并没有冠以“后现代”这一术语。

大卫·拉斯奥曾指出,“后现代主义已经开始重新塑形经济学:一是通过批判现代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和经济学家写作和谈论他们所做工作的一般方法;二是通过挑战经济学的具体内容和现代主义经济学家处理诸如均衡、不确定性和理性等问题的特定方法”(David F. Ruccio, 1991)。受此启发,本文认为,当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元素”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集中于或可归类于经济哲学领域,表现为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的哲学上的自我反省正在不断增强,另一类则分散于众多的经济学学派之中,表现为这些学派的具体的理论主张、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对于后一类,则需要进一步地整理、研究。^⑫

注释:

还有理性经济人的提法,与经济人、理性人几乎同义。在本文中,如不做特殊说明,这三个概念或术语是不加区分的同义使用的。

该文中的制度学派是指老制度学派。

段雨瀾:《经济人假设问题研究》(博士论文),可见:<http://hp.shufe.edu.cn/hpthesis/duanyulan.htm>。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文中的第三个方面,目前更多地被称之为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

关于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初步了解,可分别阅读:谢立中、阮新邦:《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理论:诠释与评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导言”部分;李银河:《女性主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后现代女性主义”部分;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文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导言”部分。

也可以看出,(2.2)则对应着“科学人”(homoscientis)的假设,但是这并非本文的重点,故不做论述。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本文中,人的主体性主要指的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性,即“经济人”。

“知识型”是福柯提出的术语,大致可以理解为某一时代的人们所普遍遵循的认知模式与概念体系,类似于“范式”的概念,但它是一个更大学科范围和更大时间跨度的概念。福柯认为,自16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先后出现了4种知识型: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17-18世纪古典时期知识型,19世纪以来的现代知识型,当代知识型。而当代知识型可以理解为后现代知识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是由于阿玛格雷奥和拉斯奥最早地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引介,二人被希拉·道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经济学家。参见希拉·道:《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141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这本书出版于2001年,但是该书的基本雏形形成于1995年,即在美国California-Riverside大学举行的主题为“Postmodernism, Economics, and Knowledge”的研讨会,该书基本上是提交给该研讨会的论文集。

对女性主义经济学学派的进一步了解,可参见:贾根良、刘辉辉:《女性主义经济学述评》,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5)。

在经济学文献中,“Self-interested”一般被翻译为“自利的”,但是本文认为,在该文中,翻译为“我利的”更为合适。

“我向”的含义是指行为总是经过自我利益的考虑而做出的,可以看出“我向”并不等同于利己,或者说排除了利他行为,“我向”思维认为利他行为是在理性人具有利他行为偏好的条件下做出的,也就是说,理性人是因为考虑到了利他行为能给自己带来效用而采取了利他行为。

⑪“话语”(Discourse)是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和术语,简单地说,话语可以大致理解为各种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知识),但是,与传统的观念不同,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并不认为这些知识是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并且价值中立的“科学”,而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视角下,“包含了价值、社会利益和型构人类历史意愿的……并卷入了自我和社会形成过程”的话语(参见史蒂文·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中文版,19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⑫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主体间性”和“关系中的自我”这两个概念或术语并不是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中首先提出来的,但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动地接纳了这两个概念,并进一步发展了它们。

⑬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也有部分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并不主张放弃主体性这一概念,这更可以看出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于主体性不明确和矛盾的态度。

⑭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也有人将“Overdetermination”翻译为多元决定论,本文认为不是很妥,这种译法体现不出互为因果、倒向影响的双向关系。因为“多互决定”虽然也强调原因的多重性,但更强调互为因果性。

⑮经济学的“后现代转向”最早是由大卫·拉斯奥提出的,他写道,“经济学中的后现代转向正在重新塑形经济学家做学问的方法,尤其是作为20世纪的经济学之最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Ruccio,David F.,1991. “Postmodernism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Vol.4, pp.495-510.)。

⑯值得提到的是,该书的英文版出版于2002年,因此可以说,直到现在,主流经济学家,包括部分非主流经济学家,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仍然是消极的、不以为然的。

⑰需要一提的是,Postmodern Moments in Modern Economics一书对经济学中出现的大量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或特征的后现代元素,进行了初步的、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整理。

参考文献:

1. Amariglio, Jack, 1988. “The Body, Economic Discourse, and Power: An Economist's Introduction to Foucault.”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4, pp. 583-613.
2. Amariglio, Jack and Ruccio, David F., 2003. *Postmodern Moments in Modern Econom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 Blaug Mark, 1998. “Disturbing Currents in Modern Economics” *Challenge*, Vol. 3, pp. 11-34.
4. Cullenberg, Stephen; Amariglio, Jack and Ruccio, David, 2001. “Introduction: Postmodernism,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http://www.economics.ucr.edu/papers/papers00/00-06.pdf>.
5. Cullenberg, Stephen, 1999. “Overdetermination, Totality, and Institutions: A Genealogy of a Marxist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4, pp. 801-815.
6. Figart, Deborah M., 2005. “Book Reviews (for Feminist Economics Today: Beyond Economic Man).” *NWSA Journal*, Vol. 3, pp. 213-215.
7. Ferber, Marianne A. and Nelson, Julie A., 2003. “Introduction: Beyond Economic Man, Ten Years Later,” in Ferber, Marianne A. and Nelson, Julie A., eds., *Feminist Economics Today: Beyond Economic 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8. Garnett, Robert F., 1999. “Postmodernism and Theories of Value: New Grounds for Institutional/Marxist Dialogue.”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4, pp. 817-834.

9. Nelson, Julie A., 1995. “Feminism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 pp. 131-148.

10. Resnick, Stephen and Wolff, Richard, 1985. *Knowledge and Class: A Marx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1. Ruccio, David F., 1991. “Postmodernism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Vol. 4, pp. 495-510.

12. Waller, William and Jennings, Ann L., 1990. “On the Possibility of a Feminist Economics: The Convergence of Institutional and Feminist Method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2, pp. 613-622.

13. Waller, William, 1999.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Feminism, and Overdetermin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4, pp. 835-844.

14. 陈平:《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转型实验中的作用有限》,载《经济研究》,2006(10)。

15. 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冬季卷)。

16. 贾根良、刘辉锋:《女性主义经济学述评》,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5)。

17. 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载《社会科学战线》,2006(1)。

18. 李银河:《女性主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9. 刘小枫、渠敬东等:《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载《开放时代》,2006(1)。

20. 汪丁丁、罗卫东、叶航:《本土问题意识上的中国自主性经济学》,载《浙江社会科学》,2003(1)。

21. 王治河、薛晓源:《全球化与后现代性》,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2. 谢立中、阮新邦:《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理论:诠释与评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3. 叶航、汪丁丁、罗卫东:《作为内生偏好的利他行为及其经济学意义》,载《经济研究》,2005(8)。

24. 殷杰:《当代西方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现状、趋势和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3)。

25. 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文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6. 大卫·雷·格里芬:《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见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文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7. 大卫·伯姆:《后现代科学与后现代世界》,见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文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8. 凯瑟琳·凯勒:《走向后父权的后现代精神》,见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文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9. 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中文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0. 彼得·毕尔格:《主体的隐退》,中文版,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1. 希拉·道:《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32. 史蒂文·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中文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单位:青岛理工大学经贸学院 青岛 266520)
(责任编辑:孙永平)